

从《狼图腾》看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

吴秀明 陈力君

《狼图腾》作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第二阶段的重要作品,其复杂文本和混杂观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伦理”与“生态伦理”之间的矛盾。尽管目前生态文学存在诸多的问题与不足,但它却为文学超越固有的思维视野、写作模式、伦理空间和形象谱系,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生态文学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90年代为生态文学的预演阶段,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开始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新领域,生态观念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其具体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传统农业文明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生存空间的污染、江河湖海、森林草原等自然环境的恶化的描写上,以此来警示地球的生态危机,呼唤人类的生态安全。代表作有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倾听大地》、《地球传》、《长江传》,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长江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等等。这些作品大多以激烈的情绪抨击人类无度的欲求和各种恶劣行径,揭露环境恶化后严重后果和深重灾难,以沉重的口吻表达生态的忧患意识。这一阶段的生态文学痛心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破坏,逐步开始人性的反思。从表现的对象上看,它主要描述非生命的自然资源被人类肆意攫取破坏,与人类相关的环境空间的改变,人类在作品中往往被描述成恶势力的代名词而遭受谴责;在表达方式上,主要是针对人类活动的强烈情绪化的质问,揭露各种生态危机的情感宣泄;在文学体裁上,是以自然环境恶化事实陈述为主的纪实性散文和报告文学等文学类型。

随着生态文学创作的进展,生命平等意识和生物种群共存等生态主义思想日益蔓延开来,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学热潮得以深入,动物形象大量出现。特别是一直作为丑恶、残忍、狡诈的反面形象的凶猛动物的重塑,更是成为此阶段生态文学的一道新景观。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沈石溪的《残狼灰满》、雪漠的《猎原》、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等一批作品集束性地推出,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昭示了

文学创作在生态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表现的对象上看,它开始从自然环境的描写推进到动物形象的塑造,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非人类的主体形象如狼、羊、狗等;在表达方式上,由简单地全盘质疑否定人类开始进入理性的阐释,客观分析生态环境具体原因,并试图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具体途径;在文学体裁上,大量出现深入探讨生态问题的中篇小说。这表明生态文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狼图腾》就是此阶段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不仅完全改写了人们对狼的认知,赋予了狼性以坚忍不屈、英勇无畏、团结协作的独特禀性,而且在其影响和带动下,文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狼风”。如今,这股“狼风”的高潮已过,作为一部作品,《狼图腾》也不像刚出来那样炙手可热,但它因涉及文学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以及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故仍引起学界的关注,争议和质疑的声音似乎一直没有中断^①。

与当下大多数被冷落的文学作品相比,《狼图腾》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这部长篇小说自 2004 年出版以来,围绕着如何评价,雷达、孟繁华、陈晓明、李建军、丁帆、李小江、周涛、顾彬等,都曾发表过毁誉不一甚至截然对立的意见。肯定者认为,它是“一部因狼而起的关于游牧民族生存哲学重新认识的奇书”(周涛);另有学者则通过提炼书中隐含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类生态和生命生态四大系统,以文学形象的方式推崇整个生命系统中的野性特征和进取精神,“一方面,它有意突出表现所有野生动物身上顽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也试图表现这一生命力是如何丧失或如何被剥夺的”^②。否定者则认为,它“具有侵略性质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文化情绪和价值主张”,仅“是一堆干瘪、朽烂的豌豆”^③;“《狼图腾》的误区,就在于它宣扬的生存哲学不过是赤裸裸的动物求生法则,完全排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道德约束和价值准则,而将‘自我保存’的本能扩张到了极致,似乎为了存活下去,任何事都可以去做。这就是一种公然的反文明话语”^④。综合诸多影响广泛且争议激烈的评论,赞成的声音主要侧重于其题材的新奇和思维方式的别具一格,通过草原狼这一动物形象来解读它们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特殊功能,以生态学视角重申人、狼关系和人、狼于自然环境的价值意义,强调狼在草原环境中的生态功能;而批评的声音则立足于传统的人学或人论的立场,针对《狼图腾》中狼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认为它宣扬了“兽性”、“丛林法则”和暴力血腥、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完全背离了人道主义精神,是反人性和反文明的,等等。

如何看待上述讨论?我们认为除了论者观念、立场、视角等因素外,《狼图腾》文本自身的复杂和观念的混杂,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缘由。首先,在表现的题材上,《狼图腾》既直接描述草原生态中的人与狼的关系,又试图通过“狼”这一形象来表达人类世界民族种群的关系,既记叙了知青陈阵的经历及狼在蒙古草原生息和灭亡的过程,同时又试图通过“后记”来挖掘草原狼的积极进取的“狼性精神”的民族推广价值。其次,在写作立场上,《狼图腾》以狼的生态价值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但同时他又确立狼在草原生态中的核心作用,甚至为了突出狼的作用而牺牲其他生命种群。《狼图腾》在价值取向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沿袭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消解人类至尊的同时又确立了狼性至纯的论调,似乎游离在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伦理与更为宽广的生态伦理之间。当然,无论如何,它已开始深层次地触及生态主义理论,并努力通过神奇惨烈的宏大叙事,将这一切转换成惊心动魄的场面,给人以血脉贲张的阅读感受。这也是它吸引读者的亮点所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狼图腾》的“后记”。在这篇洋洋洒洒近两万字的“后记”中,作者将草原狼的自然生态功能提升至民族精神特性,藉此批判农耕民族的懦弱的“羊性性格”而推崇游牧民族积极进取的“狼性性格”,拿它来作为治理“中国病”的良方。然而这部分名曰“理性挖

掘”的文字,不仅脱离主体形象而且逻辑混乱,反倒成了作品的累赘。作者在“后记”中的思考也暴露了作者对文明史的偏执理解和自己精神资源的不足。众所周知,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对汉民族种族性的忧思一直绵延不绝。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自然本性的遮蔽和丧失,促使我们在面对外族和他者文化时进行深刻反省。社会制度的规整和社会活动程式化的禁锢,日常生活方式的精致和雅趣,导致人类生命活力和精神原创性不断弱化,这一切已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一大动因。莫言、张炜、张承志、迟子建、韩少功等作家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种族的忧思。上世纪80年代具有广泛影响的《红高粱家族》就通过野地情感、野路生存、野味性格来寻找渐被遮蔽、撒落在民间的野性力量,来表达对中华民族种族生命之源和文化原质的挖掘;之后,作家莫言在《檀香刑》和《四十一炮》等多部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揭露各种过度压抑、过度规约造成的禁忌、隔绝,剖析原始生命力的逐步流失而形成的人性窒息状态,努力追寻我们民族种族个性反抗蒙蔽的原始力量,呈现出对民族种族优质探寻的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心态。

与之相较,《狼图腾》通过蒙古狼性嗜血性格的宣扬,表达的却是对汉民族礼仪之邦、文明人性性格的绝望心态。作者不仅将自然法则简单挪移至人类社会,还进而将狼与羊的自然角色直接套搬到不同的民族关系中,用自然生态观来替代人类社会中的民族文化观。将自然界中的动物种群关系直接比拟为人类社会中的民族关系,这样的类比有点近乎可笑。它与同时期出现、同样通过狼文化来反思人类生态责任的《怀念狼》就全然不同。在《怀念狼》那里,尽管也写狼颂狼,但贾平凹却认识到人、狼关系的复杂,人类面对狼有难以抉择的痛苦。当人类对狼获得绝对制胜权而对狼进行保护时,不仅不能使狼明白人类的良苦用心,反而加速仅存的狼的消亡。在此,作家在透露人类面对自然行为的艰难的同时,也通过艺术的方式质疑了生态理论和生态原则操作的可行性和可能性。生态理论作为人类自身提出的一种限制人类的理论,它本身似乎就是一个悖论。就这样,贾平凹于中不仅表达了人类在战胜自然过程中人的欲望和意志增长造成的傲慢、自大心理及相应的人性的肆意、酷虐等非人道的忧虑,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如果违背自然生态原则而随意加以趋奉,那么它不仅不能达到保护自然和实现生态理想的目的,相反会招致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而使自己陷于无所适从的境地。

那么,为什么《狼图腾》出现如上的失误呢?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加剧,民族意识的增强等,显然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种内外互动互渗的共同作用,趋奉强者、强权的“狼道哲学”才会得以张扬。当一大批的凶猛动物在文坛上大发“兽性”时,其背后宣扬的其实就是弱者对强者的无条件服从。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狼图腾》中“狼道”广受质疑,另一部小说《藏獒》则在另一凶猛动物藏獒身上发掘出对人类的无限“忠诚”。这是否意味着凶猛动物的残忍本性只要于人类有益,就值得推崇呢?我们认为,这种创作倾向同样未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它与真正的生态文学貌合神离。人、狼关系与类人狼关系的文学由对人类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反思到因推崇强权漠视弱者生命尊严,强调对自然的无条件服从,它说明生态文学无限扩大动物凶猛的作用和功能时,实际已与趋奉强权及推崇奴性直接挂钩。

以上,我们用较多篇幅分析了《狼图腾》特别是“后记”中存在的问题。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所有这些只是《狼图腾》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主体部分。在这点上,我们比较赞赏雷达的判断,他认为“狼才是《狼图腾》这本书的精神主载体,狼的狡猾,狼的智慧,狼的生命强力,狼的团队精神,以及狼性,狼眼,狼嚎,狼烟,狼旗等等,才是全书的看点所在。对此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以审美的、充满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实用

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狼固然凶残,但在文学王国里,未必就不能构成一种复杂的审美意象;狼肯定吃人,但通过狼性未必就不能更深邃地揭示人性。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有时是需要分开的。在人类生活中狼是可诅咒的,在艺术世界里狼完全有可能成观赏的对象,就看置于什么样的语境了”^⑤。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道理,我们不大赞成对《狼图腾》持完全否定的批评态度,尤其是不大赞成用道德义愤的实用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实事求是地讲,作者偏激的思想的确在相当程度上窒扼了该书形象体系的创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形象体系毕竟具有一定的自洁的能力。对其“后记”,也应作如是观。他那不无冗繁的所谓“理性探掘部分的理论实际上与主体形象部分的形象并不融洽,甚至可以说理性探掘部分有时恰好在消解主体部分的思想”^⑥。正因此,我们在评价时应立足于全书的整体形象体系,不能以偏概全,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狼图腾》及其生态文学自身的矛盾复杂看似偶然,实则带有深刻的必然性。对于中国来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客观事实,使任何一种需要统一背景的理论在面对各种具体问题时不可避免地遭遇尴尬。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社会文化的演进使人们获得较大的自由,人性尊严和人的独立意识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人们普遍认识到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启蒙任务仍未完成。而人类战胜自然后造成的环境恶化、生物品种减少的各种生态危机尤为突出。如何在更为广阔的生命世界中反思人性,善待生命,关爱自然万物的生态理念就成为启蒙反思的有力武器。

一方面要继续“立人”,另一方面又要对“人”的命题进行反思,赋予其时代的新内涵,以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覆辙——这就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在当今世界语境中面临的尴尬,一种纵向时间链(古今关系)与横向空间坐标系(中西关系)严重“错位”的尴尬。它也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当今的真实的生存状态。为什么在《狼图腾》的评论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颇有市场,甚至公开表明不赞成生态理念、坚守“人类中心主义”的也大有人在,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也告诉我们,《狼图腾》刮起的“狼风”和争议,既显示了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表明它在中国的艰难复杂以及可能产生的弊端,那就是有意无意地用“人”的问题遮蔽或取代生态问题。

生态文学是一种基于生态主义思想的写作。它试图打破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和动态平衡。遗憾的是,在文学实践中,生态主义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不少作品只是浅层次地对环境破坏及其肇事者进行讨伐,最终将责任归之于人性的丑陋与丑陋的人性。这看似尖锐激烈,其实并没有真正道出中国生态问题的深层本质。《狼图腾》也有类似的问题,在作品中,作者将人与狼关系设为完全对立的关系:要么人长狼消,要么狼长人消,两者必居其一,只能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实际上,真正要获得人或狼的价值,只有将它们返回到整个生态链中进行考察。至于“后记”将原本属于自然生态的问题硬生生地转化为人类社会问题的表达,说明了作者生态观念的淡薄和思维的混杂。他没有认识到生态理论不是万能的,它不仅有自己的局限,而且还有一定的适应域。如果不加规约地滥用,就有可能推导出荒谬的结论。

与上述简单化的做法相似而又有所区别,是有的作者在进行创作和批评时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取消对生态文学的审美评价。他们赞同或贬责一部作品仅凭其生态理念的确当与否,至于文本本身的形象体系如何似乎无关紧要,或很少涉及,更遑论内在的生态理念与艺术描写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及复杂的隐显关系。对《狼图腾》的批评似乎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脱离具体文本而用一般社会学、文化学方法进行批评的也不是没有,而实际上,它自身的矛盾复杂

是很难用单一的观念来统率和涵盖的。雷达在评论《狼图腾》时指出:“我们应该把对其文学文本的评价与对其文化宏论的评价分开来。在我看来,作为文学文本,《狼图腾》集聚了大量原创因素,属于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诗品相的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文化观的宣扬,它仅凭一个‘狼性格’就好像找到了一把开启世界文明史的钥匙似的,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和改写整个人类史、文明史、中国史。尽管作者动机可嘉,不乏睿智,深思多年,固执己见,但漏洞毕竟太多。”^⑦我们赞同雷达的意见^⑧。

尽管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不如人意,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不足,但生态观念的引入还是为文学超越固有的思维视野和写作模式,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首先,生态文学拓展了伦理叙事的空间,它使文学创作从原有单一的文化伦理走向兼及生命伦理的多元伦理书写。其次,生态文学丰富了形象谱系,它使文学创作从人的形象走向兼及生命形象的立体形象书写。生态文学既写人也写非人,它通过各生命种群的描写丰富和拓宽了形象的主体,使自然万物特别是动物作为带引号的“人”进入文本中心。自此,人类与动物关系多了一个维度,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动物从人学文本的修饰衬托的辅助作用变为人类情感和人道关怀的主体对象。于是,动物形象也因此获得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一方面,动物身上不断地体现“人性”特征,表现出与人类相当的能力、尊严和意志,动物不断地呈现人类的灵性气质和情感特征,如《怀念狼》中老狼的感恩行为、《藏獒》中藏獒的忠诚气质等;另一方面,动物身上曾经被遮蔽的动物性得以恢复乃至“平反”,作品中动物特性往往得到与人性同等的尊重和理解,动物的“非动物性”被视为动物的“异化”,由此动物驯化被视为动物特征的逆流。许多生态文学都悲叹在人的驯养过程中不断失去动物野性的反生态行为,《怀念狼》中提出大熊猫的蜕化处于逐渐丧失动物野性的结果;《守望家园》中“海洋篇”也提出海洋凶猛动物的消失使得下级生物链的鱼类失去生存危机开始蜕化,从而深层次地影响了海洋生态。《狼图腾》中的知青陈阵也为拔去小狼利牙使小狼丧失野性存在的物质基础而痛苦不已。这些作品都在努力刻划被人的意识遮蔽了的动物本性,从人的观念中解放动物本性并使之得以复原,确立动物在生态世界中的“性格”和“气质”。人类的独立、平等和自由观念能够在动物界适用,说明人类已经将“兼爱”扩展到生态系统中,动物才具备与人类同等的生命价值的可能,而成为了人类反思的参照物。这对现实和未来的文学也将会产生影响。

①④ 丁帆、施龙:《人性与生态的悖论——从〈狼图腾〉看乡土小说转型中的文化伦理蜕变》,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就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② 李小江:《从生态学看〈狼图腾〉的后现代叙事结构——兼谈人类还有多少选择空间》,载《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③ 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⑤⑥⑦ 雷达:《〈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载《光明日报》2005年8月12日。

⑧ 相关讨论可参见吴秀明、陈力君《论生态文学视野中的狼文化现象》,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宋蒙